

世界上最早的佤文版《圣经》

王育珊(佤族)

我要向大家介绍的这本世界上最早的佤文版《圣经》(1938年)是先父王敬骝于1956年随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佤语组到阿佤山区调查时,一位佤族撒拉赠予父亲的,后来,当我开始学习佤语文字时,父亲又把它送给了我。

佤族是我国云南省西南边疆地区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之一。他们主要分布在思茅、临沧地区的西盟、澜沧、孟连、沧源、耿马、双江、镇康、永德等地,这里崇山峻岭,河流纵横,自然资源非常丰富,素有“阿佤山区”之称。长期以来,佤族人民在这里繁衍生息,同其他各民族共同发展,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与文化。

1902年已经在缅甸景栋从事传教活动多年的美国浸信会(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)传教士永伟里(William Young)正寻求机会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教。有一些倍受满清政府和傣族土司压迫剥削,反抗又遭镇压的佤族民众逃到缅甸景栋地区,他们被永伟里接纳,并加入当地的浸信会,成为最初一批佤族基督教信徒。基督教也由此开始向佤族社会大规模的传

播。短短几年里,基督教很快地从缅甸传到我国境内佤族、拉祜族、傣族聚居的双江、澜沧、孟连、西盟、沧源、耿马、镇康等县,佤族、拉祜族信徒也增至万余人。永伟里的活动中心也由缅甸景栋转至云南省澜沧县糯福地区,并将上述地区控制在自己的传教势力范围之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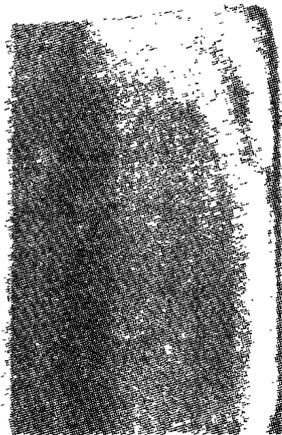
然而,永伟里的传教活动并非如所想的那

样一帆风顺。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和精神信仰,基督教不可避免地要和佤族社会原有的宗教信仰、思维方式、价值观念、传统习惯及其生活方式等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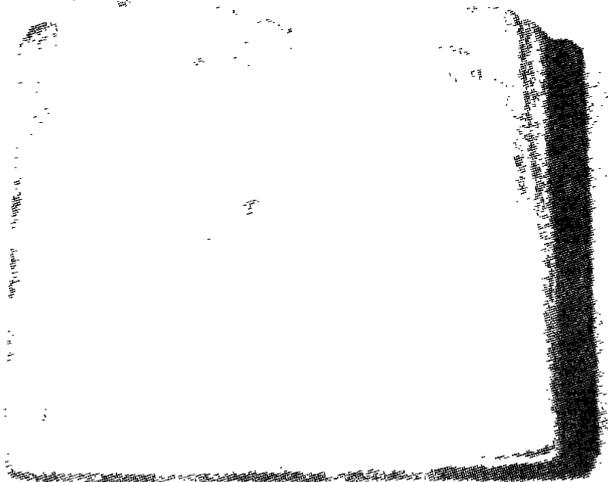
生碰撞和冲突,永伟里的传教活动曾一度受阻。为了尽快使当地的佤族群众接受基督教,他吸取以往的传教经验,努力探求着更为有效的方式,将福音送到人们心中。于是他努力学习佤语,研究佤族,每到传教的地方,他都和佤族群众同吃同住,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们传教。当他能用流利的佤语讲解福音时,他开始热衷于《圣经》的翻译。在一些佤族撒拉(佤族称传教士为“撒

拉”)的协助下,永伟里和他的两个儿子永亨乐(Harold Young)、永文生(Vincent Young)以澜沧、沧源两县毗邻的安康、岩帅一带的佤语为基础设计出了一套用拉丁文字母拼写的佤文,佤语称之[lai sa la]“赖撒拉”,意即“传教士的文字”,并用这套文字开始了佤文《圣经》的翻译。为了尽快让民众看到《圣经》,他们译完一部分,就出版一部分,最先于1934年出版了佤文《约翰福音》单行本,1935年又出版了佤文《马太福音》单行本,直到1938年才翻译出版了全本《新约全书》,这便是世界上最早的佤文版《圣经》。当时为了使佤族群众易于接受《圣经》教义,永伟里等传教士在翻译佤文版《圣经》时,颇动了一番脑筋。他们把《圣经》同佤族的创世神话、传说、民间故事以及生活习俗等结合起来,用佤族传统的宗教观念来表达基督教的神学涵义,让基督教观念和佤族传统的文化信仰巧妙地结合在一起,从而使人们认同基督教是自己的宗教并接受它。

在翻译中,为了易于为佤族人所接受,永文生充分利用了佤族文化本身所蕴藏的丰富资源,可谓用心良苦,例如,将“新约全书”翻译为“HPK LAI SIGANG SI SIYEH PA HKRAO”,佤文的字面意思是神赐的金葫芦新书。因为佤族认为他们的祖先是来自葫芦里出来的,那《圣经》必然与“葫芦”有关,可见永文生对佤族的创世神话作过一番研究。再如,《新约·马太福音》第一章中就大量使用诸如“siyeh(神仙)”、“hkuwan(魂魄)”、“jao; si mehang(王,官家)”等佤族原始宗教概念,来表达英语里的“God”、“the Holy Spirit”、“the Lord”之类的概念。文中还大量使用一些口语来解释一些抽象的概念,如,佤语里没有专门的名词表示east(东方)这个词,他就把它译为“plak li singai(太阳初升的方向)”,为了易于理解king(国王)这个词,就把它译成“hkun haw hkam(金銮殿的主人)”,如此以来,他的翻译通俗易懂,颇能引起佤族群众的共鸣,并为他们所接受。由于历史原因,永伟里等人没有完成对《旧



1938年佤文版《新约全书》封面。黑色硬皮精装。上印有佤语书名“HPUK LAI SIGANG SI SIYEH PA HKRAO”(神赐金葫芦书,即《新约全书》)



佤文版《新约全书》书名页。除印有佤文书名外,还有英文书名“THE NEW TESTAMENT IN WA”(佤文《新约全书》)。译者“M·VINCENT YOUNG”(永文生),出版地“RANGOON”(仰光)、出版社“AMERICAN BAPTIST MISSION PRESS”(美国浸信会出版社),出版年代“1938”。

约》的翻译,而佤文版《新约》的翻译也不尽如人意,但它的出版与发行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佤族文化教育的发展,并对佤族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。“撒拉文”在一定范围内结束了佤族“刻木结绳记时记事”,一切文化遗产只能靠言传身教的落后状况。信徒们通过诵读《圣经》,学习“撒拉文”,还在教会学校里学一些基础算术和自然科学知识,由此产生了一批佤族自己的知识分子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。